

比較研究視域中的文學、漢學 和宗教研究

——第十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班綜述

Literature, Sinology, and Religion in a Horizon of
Comparative Studies: Review of the 10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張華、李丙權

ZHANG Hua, LI Bingquan

作者簡介

張華，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李丙權，中國人民大學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Hua, Professo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LI Bingquan, Lectur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nghua@blcu.edu.cn; lbqwxxy@ruc.edu.cn

Abstract

From September 18-21, 2014, the 10th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at Yanbian University, Jilin Province. The theme of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since the meeting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1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More than twenty academics from US, UK,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at the Summer Institute meet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mparative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and discussion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areas, from translation and hermerneutics,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n classics, Biblical literature, western literature,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meeting. Across the spectrum of papers, we can see clearly ho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in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share common research ground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how inter-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a and beyond may fruitfully draw on and appropriate a comparative language and perspective.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4年9月18日至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和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協辦的第十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班，在吉林延邊大學舉行。本屆暑期國際研討班同時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的一個圓桌論壇：“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分論壇。來自美國、英國、香港和國內11所高校共22位學者參加了本屆暑期國際研討班。在“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這一框架之下，與會學者的討論涉及翻譯與詮釋學理論、比較經學、聖經文學、西方文學、漢語神學、漢學研究和宗教研究等多個領域，並對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研究的融合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西方文學與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密切關係廣為人知，也早已成為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然而宗教研究何以和比較文學並列？事實上，宗教學作為一個學科，在其成立之初便是以“比較宗教學”的形式出現的。宗教學的創始人麥克斯·繆勒曾有言：“只知其一，一無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意為只懂一種宗教的人，其實什麼宗教也不懂。因為“宗教”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宗教現象則是具體而豐富。世界各民族各地區都有各自的宗教。要探討宗教的本質，認識宗教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價值，就不能不對世界上各種宗教現象以比較的方式進行科學的研究。可見，比較意識內在於宗教研究的學科的基因之中。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處境中，文化間的交流 and 互動日益頻繁。宗教作為文化和文明的內核，是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的關鍵，在多元文化處境中重申宗教研究的比較意識是為一種“去中心化”的對話精神的體現。

比較文學注重文字研究，通過解讀經典文字中的宗教精神或者細查對經典文字的宗教式解讀不僅會拓寬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也會使宗教研究更加深入。在此意義上，漢學可以成為比較文學和宗

教研究結合的很好的切入點。漢學作為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本身即是一種跨文化研究，具備內在的比較研究意識。漢學研究經歷了傳教士漢學、漢學家漢學階段，正朝向一種多元文化處境中的新漢學發展。無論是傳統的漢學研究還是新時期的中國研究，都以古代中國文化經典作為自身的基礎，而經典的翻譯是漢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基石。初期的漢學家以基督教傳教士為主，他們大量翻譯中國文化經典，不是出於對中國文化本身的興趣，而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傳教的需要。這決定了傳教士譯者的詮釋學視域是基督教神學，這種詮釋學立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傳教士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評價，也決定了他們對術語的選擇和對譯文的處理。傳教士們試圖運用基督教的術語和觀念解讀中國經典，把中國文化納入基督教神學的解釋體系。其後的學院漢學家雖然避免表現出明顯的宗教傾向，但在深層意識上仍然沒有擺脫“西方中心”的立場。然而，正是這種文化的誤讀為我們提供了比較宗教和比較文學研究的絕佳文字。西方譯者用以翻譯中國經典的概念勢必對中國讀者造成差異感和陌生感，這反而邀請、照亮並更新了我們對自身傳統的理解。借助對中國經典的理解，我們同時也更好、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的概念範疇，以及體現於其中的宗教精神。在這樣一種雙向理解中，展示了文化交流的原發的、動態過程。

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基督教中心”和“西方中心”的詮釋學視域不再僅僅是一種理解的障礙，作為一種詮釋學上的“偏見”，它們恰恰提供了更豐富的詮釋學可能性。故此，對西方漢學、中國經典外譯、西方經典文字（如《聖經》）及其中譯的研究可以開闢一個雙向乃至多向的詮釋學空間。而體現在其中的平等、對話和“去中心化”的立場也可在方法論上為比較文學、宗教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鑑意義。跨文化和比較研究需要打破一種單向的、本質主義的決定性思維，尋求平等的對話和互釋。在比較研究的視域中，比較文學、漢學和宗教研究相遇，這不僅大大拓展了傳統的

文學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空間，也促進了跨學科研究的發展。在此視域中，聖經文學、比較經學、漢語神學的研究也呈現出新的面貌。

一、經典翻譯、詮釋學和漢學研究

經典文字的翻譯在比較文學、漢學和宗教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對翻譯的理解經歷了一種從“工具論”模式到“詮釋學模式的發展”。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翻譯及其詮釋學視域問題獲得了新的意義。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以《經典旅行中的加法和減法：以〈威尼斯商人〉的漢譯及其選擇為例》為題，從《仲夏夜之夢》第三幕第一場對話中的一句話“Thou art translated”入手展開討論^①。楊慧林指出，此處的“翻譯”（translated）意涵在中文譯本裡已經被隱含了，卻與“Thou art changed”一並被表達為“變了樣兒”或者“換了一個樣兒”。“translated”一詞從“翻譯”到“換了一個樣兒”，被塗抹或者模糊的還只是詞語本身的隱含義；如果推及作品背後的文化隱含義，這種下意識的塗抹和模糊則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一部作品在不同語境中的改寫和接受，往往由此而來。楊慧林進一步指出，反過來看，如果針對“文化無意識”和“前理解”的頑強張力，在譯介活動中充分“還原”那些“不可化約的”隱含義，經典的旅行又可能為異域文化添加新的意義，並且也在自己的語境中進一步強化這一意義。隨後，楊慧林以《威尼斯商人》為典型案例，結合不同的中文譯本，就作品之“意義”文字和語境化的“翻譯”、“還原”以及“延異”的狀況，進行了詳盡分析和闡釋。

中國人民大學李丙權博士的論文《從〈論語〉英譯看經典翻譯的詮釋學視域》則以西方世界對《論語》的英譯為例，探討了經典

^① 原文如下：“O Bottom, thou art changed! What do I see on thee? What do you see? You see an ass-head of your own, do you? Bless thee, Bottom! Bless thee! Thou art translated.”

翻譯中的詮釋學視域問題。他認為，翻譯作為一種詮釋活動，具備“語言內”翻譯和“語言間”翻譯兩種不同維度；於此相應，翻譯天然具備“古今之分”和“中外之別”兩種視域。經典翻譯的雙重視域不僅指向“中國概念如何走進西方”（語言間翻譯/中外視域），同樣還指向“經典如何走入現代”（語言內翻譯/古今視域）的問題。讓經典走入現代涉及到對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即我們當如何創造性地轉化傳統來面對當今世界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思考何為西方、何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同時，細心分辨其後隱含的古代和現代性視域，把對現代性的反思滲透到對中外文化傳統的思考之中，在某種共性的基礎上審視所有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林子淳博士對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從現象學、詮釋學的角度進行了探討。其論文《不同世界的文字可能比較嗎？——兼論一個聖經互文案例》處理的是一個有關進行比較文學的底層理論問題。這一學科在今天雖然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學科，可是對於從人文學術的理論探究者來說，來自不同語言、文化、種族、境域等等背景元素的文學作品可以作比較，是一個需要澄清的基礎性議題。林子淳不僅從哲學尤其是現象學傳統檢視了這個問題，還從宗教學角度提出了一個具體案例——聖經的互文——作為說明。

對經典翻譯和詮釋學研究的興趣與近年來中國學界對西方漢學研究的興趣相伴而生。在對早期傳教士漢學的研究中蘊含著豐富的比較文學和宗教研究資源。上海師範大學講師丁大剛的發言《儒耶對話之道：從理雅各英譯孟子“性善”談起》認為，理雅各對孟子性善論的譯、註、評涉及經學詮釋學、比較哲學和比較宗教學的知識，因此，分析理雅各英譯本《孟子》中對“性善”的理解，需要結合理雅各的翻譯思想和宗教哲學背景，進行多維度、多層面的闡釋。他的發言針對理雅各英譯本《孟子》幾個篇章中對性善的翻譯和注釋，以及緒論和其他著述中對孟子性善論的理解，進行了跨

文化解讀。

濟南大學劉麗霞教授在發言中強調了近代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她的論文《近代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及影響》，在收集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比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來華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學的譯介概況，探討了來華耶穌會士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通過這些原始資料的研究可以看出，近代來華耶穌會士繼承了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的漢學研究傳統，將文學作為考察中國文化的重要視窗，並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為西方的漢學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外，山東師範大學李海英副教授也以《日本明治刻本〈大清文典〉的學術價值》為題進行了發言。論證了由美國來華傳教士高第丕和中國知識分子張儒珍合著的《文學書官話》在海外的影響及其在漢語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比較經學和聖經文學

對中國經典外譯的關注在方法論上部分地受到西方學界“經文辨讀”運動的影響，甚至冠以經文辨讀之名。在經文辨讀理念影響下，比較經學研究近年在漢語學術界逐漸興起。其提倡者和代表人物當屬中央民族大學的游斌教授。在這次研討班中，游斌教授以《論比較經學作為漢語基督教經學的展開途徑：兼以朱子之讀經法為例》為題，針對在漢語學術界中開展的聖經研究必須要面對的“多元經典”處境，提出以“比較經學”作為漢語基督教經學研究的可能途徑。他說，通過對聖經研究學術史的考察，多元宗教、多元經典之間的比較經學實際上一直構成聖經研究的潛在方法。而所謂“文字辯讀”與“經典辯讀”，其方法上的假設、理念及操作方式，也可視為一種比較經學的前身。游斌認為，在聖經研究的學術史基礎上，借鑑“經典辯讀”或“跨文字詮釋”等當代聖經詮釋理論，嘗試對比較經學做出一個定義，並對它可能的研究領域進行分析，

是必要和可行的。針對漢語語境下的聖經研究的特殊處境，他說，比較經學可謂是一種介於比較宗教學與神學之間的聖經詮釋方法，具有與當代比較神學類似的性質。與此同時，游斌以儒家朱熹的讀經法為例進行了一個比較經學的實踐，分析了朱熹對於“何為經”、“為何讀經”、“如何讀經”的解答，並以此反觀朱子經學對於漢語基督教經學的可能意義。

浙江大學梁慧副教授在其題為《對話的詮釋學：比較經傳學視域中的中西經典闡釋》的論文中，從比較經傳學的視域出發，探討了在本土多元化的經學傳統處境下，如何建構以“對話的詮釋”為重心的跨（宗教）經典詮釋方法論，為漢語聖經解經實踐提供一種開放的、動態的詮釋模式的問題。梁慧指出，這種構想是基於對中西古代經典解釋傳統的考察，尤其是古代猶太釋經傳統和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辯讀”與比較而產生的。論文主要選取古代猶太拉比解經學與孟子“知人論世”的尚友法，檢視各自所蘊含的“對話”詮釋特質。梁慧的論文以上述兩者的詮釋特徵和旨趣為比較的參照，認為“對話的詮釋”將是多元經典詮釋傳統中的漢語聖經詮釋學可以汲取的經學資源，從這兩大中西古典釋經源流傳遞下來的強烈的實踐傾向，也將使漢語基督教經學繼續呈現詮釋者與上帝、古今之善士持續的對話與分享，並在跨宗教的視野中深入建構本土聖經詮釋模式。

復旦大學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教授的論文《比較經典與比較神學：從明清漢學到當代宗教對話》指出，耶穌會士和中國文人經典的比較閱讀在形塑漢學的方式、焦點以及傳播途徑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他者之經典的閱讀，需要付諸接受預設性前提和挑戰的努力，而每一方逐步建立起新的詮釋原則也是必要的。與此同時，考察他者對你方經典的閱讀和理解，也是雙方詮釋自身知識整個進程的一部分。就此而言，當代文化對話語境下發展中的漢學，還有很多值得思考和亟待解答的問題。魏明德教授嘗試

通過敘述中西方在經典詮釋與交流方面的一些為學術界熟知的事實，來建立一種比較的詮釋方法，並將這一方法集中運用在“比較神學”的研究上，並希望通過這種方法論意義上的嘗試，來研究漢學、比較經學以及詮釋學在當代文化對話中遇到的問題。

除比較經學之外，傳統的聖經文學研究仍然是研討班的傳統主題之一。河南大學梁工教授在題目為《多元化聖經文學批評的當代景觀》的發言中，闡述了聖經的多重性質。他說，聖經既是古代猶太民族和早起基督教的神學典籍，又是其史學典籍和文學典籍，而且這三重品質引導了理解和闡釋聖經的三條路徑。在聖經學術史上，這三條研究路徑既錯綜交織，又各有其輝煌和繁盛之時。梁工教授認為，當代聖經批評領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觀的主要原因，在於多元文論對以往研究方法的全面拓展和有力深化。

中國人民大學張靖博士的論文《對抗暴力的智慧：〈箴言〉1-9章中的“外女”形象分析》立足文字，從詞源和翻譯入手追究意義形成過程中的“道德”建構和權力空間。張靖注意到《箴言》1-9章中的“外來女性”或“陌生女人”形象與另外一位女性“智慧婦人”或“貞德婦人”形成鮮明的對比，並已成為不道德女性的代名詞。但深究“外來女性”或“陌生女人”的希伯來詞源意義及衍變、《箴言》1-9章形成時期的文化思想背景以及《希伯來聖經》其他各卷中的女性故事（如他瑪和路得），張靖認為此類二元對立式的標籤是一種人為建構，對當時和現在的女性都是一種語言暴力，而重新解讀這一形象能夠幫助女性發掘內在的力量和智慧，反抗千百年來通過各種途徑強加於她們身上的束縛和暴力。

三、宗教研究與漢語神學

在漢語學術處境中，無論是比較經學還是聖經文學研究都不具備強烈的認信性色彩，更多是以“信仰中立”學術研究為立足點，

這與宗教研究的學術定位相符。即便是以神學運動自命的漢語神學，也堅持學術性、非教會性、非宗派性的立場。這使得漢語神學和以基督教為對象的宗教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上有很多交疊之處，非認信性的基督教研究甚至被納入廣泛意義上的漢語神學的範疇之中。作為漢語神學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劉小楓教授在本屆研討班上做了題為《從宗教改革到宗教戰爭》的發言。他認為，十六世紀發生的宗教改革運動既是一次宗教事件，也是一次政治事件。路德和卡爾文的主張涉及的都不僅僅是基督教信仰問題，僅僅把宗教改革事件限定在路德和卡爾文身上也未免過於狹窄。因此，必須把隨後的一系列事件納入宗教改革事件的範圍，從一個更大的歷史時段視角來理解宗教改革，注意到宗教改革在歐洲不同政治單位所產生的不同結果：法蘭西王國、英格蘭王國、西班牙王國和德意志地區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宗教改革有截然不同的表現。西方宗教改革的結果是基督教世界被分解為多個信仰不同教義的共同體，每個教會都宣稱其代表真正的信仰，多元教會取代了統一教會。教會的改革直接導致的絕非僅僅是教會的分裂，也直接導致國家的分裂，給基督教的歐洲帶來了長達多個世紀的政治紛爭。他認為，統治權威——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只有在基督教的奧體中才具有超凡魅力的地位，一旦教會需要服從世俗權威及其國家理由，就需要從自然中去尋找社會秩序的原則，自然秩序的原則就會取代精神秩序的原則。宗教改革導致的核心問題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問題。自然狀態、人民主權、國家理由逐漸變成了這些世俗和自然原則中最有力的概念，替代傳統的基督教信義充當政治秩序的基礎。宗教改革表明，歐洲傳統的智識和精神秩序已然崩潰，新的智識秩序尚未出現。路德教義的傳播開啟了西方文明史的一個爭論不休、動亂迭起、黨見氾濫的新時期。

中國人民大學耿幼壯教授以《傾聽的藝術與祈禱的現象學》為題，在本屆研討班上做了精彩發言。他認為，在西方思想史上，“傾

聽”長久以來就屬於一個神學概念。宗教的生活和神學的基礎就是上帝的言說和人對於上帝的傾聽。耿幼壯教授著重介紹了法國哲學家克里田關於傾聽的現象學思想。作為傾聽概念最積極闡發者和運用者，克里田從不同角度全面而深入地探討了運用現象學方法分析宗教經驗的可能性，而貫穿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傾聽。不僅如此，作為一位神學家、哲學家 and 詩人，克里田在自己的著作中將宗教體驗、神學理論與審美經驗、藝術分析融合在一起。不僅諸多藝術品成為其傾聽的對象，而且其作品本身就展示了一種傾聽的藝術。這一傾聽的藝術的最好例證之一就是祈禱這一宗教現象。克里田關於祈禱現象的分析“出色地說明了一種宗教體驗的肉身現象學如何可以自海德格爾將語言基於召喚-回應結構之上的最初設想中發展出來”。從而在作為特殊宗教經驗的召喚與回應結構和作為普遍認識論活動的問題與回答結構之間建立起一條橋樑或通道。沿著這條橋樑或通道，神學啟示與文學活動之間的聯絡或許也可以得到更為深入的探討。

以上兩位學者的發言充分體現了漢語學界神學研究的人文學進路。通過對漢語學界基督教研究和漢語神學研究現狀的分析，美國耶魯大學著名青年漢學家司馬懿（Chloë Starr）博士在本屆暑期班上展示了她的最新研究成果《楊慧林與意義的探尋》。她指出，當代中國非教會背景大學裡的基督宗教研究，特別是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跨學科研究，對形塑“中國精神”的影響已明顯超過任何中國教會神學院，而且從長遠來看，這些研究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也遠超某些宗教實踐。如此說來，對學術性或者經院式的基督宗教研究是否屬於真正“神學”的爭論，實質上是可否有以及如何進行“非宗教的基督宗教詮釋”問題。司馬懿博士認為，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在進行意義的探尋過程中，為研究和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學術資源。

上海師範大學講師紀建勳博士以《漢語神學的濫觴：利瑪竇的

“帝天說”與上帝存在的證明》為題，嘗試對“帝天說”展開另一視角的研討，認為其不僅是一種在地化策略的使用及處境神學下的發明，更是一種浸潤在經學與神學兩大詮釋傳統下的“上帝存在證明”。在利瑪竇看來，中國古人對上帝的正確認識來源於“自然法”，其本質是運用自然神學與歷史框架來構建明末的上帝論。惟“帝天說”能夠推證西方的天主與東方的上帝是文明本根處“同體異構”的概念，可以從心理及社會效應層面幫助儒家基督徒由儒入耶，並最終達致儒耶交融的理想境界。此種視域下的“帝天說”可謂漢語神學的濫觴，而不應僅將其片面化處理成譯名上的論爭。

來自英國威爾士大學的那奧米（Naomi Thurston）博士也以漢語神學為題，提交論文《〈智者納丹〉：漢語神學話語和宗教研究中的寬容原則與關於寬容的原則》。這篇論文主要討論了最近十年漢語神學和中國學術界的宗教研究問題，並援引萊辛的文學作品《智者納丹》（*Nathan the Wise*）中關於寬容的描述，提出“神學”定義的多種可能性，並就此探討了“神學”既有的所謂定義是否已經成為當今中國學術話語的“絆腳石”的問題。

四、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

自2008年開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將宗教研究設為大會的分論壇之一，強調宗教研究的比較特質及其與比較文學的關聯。比較文學這一跨文化研究中出現了更多的跨學科研究的趨勢，尤其體現在其與宗教和文化研究的結合之上。在文字分析之外，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研究中越來越注重超驗的精神維度。北京語言大學張華教授在其論文《生態批評理論的宗教始點》中提到，生態批評理論在提出之初就具有宗教背景和內涵。生態批評由最初立足於文學批評對文學與自然環境關係的研究這個始點，向更為深層的文化批評、社會批評、思想批評和政治批評為主導路向的演進，恰如生態學以

自然科學研究為始點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演進一樣，表達了人類渴望從哲學和思想層面尋找產生生態危機的原因並進而進行精神療救的籲求。生態批評的產生既有生態危機的外在現實背景，也有表現為現代性危機的內在思想背景。生態批評產生的外在背景因其可感性而較為容易把握，卻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對生態批評的表面化、形式化理解；生態批評產生的內在背景具有思辨性和哲學特徵，它引導了生態批評當代發展方向，即文化批評、社會批評、思想批評和政治批評的內涵和走向。

中央民族大學宋旭紅教授的發言同樣強調文學與宗教研究的關聯。其論文《喬納森·愛德華茲中國接受史：在文學與宗教之間》以美國本土神學家、作家喬納森·愛德華茲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為研究內容，介紹了喬納森·愛德華茲的宗教觀和藝術思想。喬納森·愛德華茲是北美殖民地時期“大覺醒”運動的領導人，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本土神學家，對美國精神史和文學史的影響均十分深遠。中國學界對愛德華茲的接受以文學領域為主，宗教方面的研究則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間才漸次彰顯。位於文學與宗教之間的這種愛德華茲接受落差反映出在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領域起到重要作用的若干潛在原則，如源文化的優先性、意識形態優先性等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汪海博士的論文《通過布朗肖重釋“無為”的激進性》顯示了鮮明的比較研究意識，為我們開啟了如何通過法國文學家、思想家布朗肖的理論重釋老莊思想之門。汪海認為，“無為”或許是老莊思想中最大的悖論之一，通常的解決辦法一是將對“無為”的理解置換為對“自然”的理解；二是盡量避免將“無為”與不行動、柔弱、無力、退隱、被動等“負面”概念群相聯絡，用大一統的辯證法將“無為”解釋為“有為”（儒家）的增補。這些解釋策略忽視了道家思想在歷史上表現出來的激進性，比如它對儒家的根本性批判；也限制了道家思想面對現代生活時的解釋力和批判力。而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文學家、思想家布朗肖對“被動性”

和“弱”的重新解讀，或許會為我們重現發現“無為”的激進性提供了一條有益的進路。

蘇州大學徐文博士通過美國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與中國儒學人文思想的比較研究，提出中國儒學人文主義其實是十九世紀“美國文藝復興”思潮的思想來源之一的看法。其《美國愛默生超驗主義對中國儒學人文思想的闡釋與再建》一文認為，愛默生對中國儒學思想的闡釋和再建與歐洲啟蒙主義者們有所不同，特別表現為《四書》《五經》等宋明理學家選本在美國的譯介與本土化闡釋，宋明理學與愛默生超驗主義思想之間形成了理論觀念的再建。愛默生的“超靈”學說與理學家的“理”和“氣”並非偶然地構成一種認識論的同一性，愛默生的“心境”觀念與理學家的“心性之學”具備了從結構模式到核心觀念之間的多元對話。徐文的論文還提出了全球化時代研究美國人文主義來源的新觀念，其歷史文字考證法與辯證理性批評均表明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張變革副教授通過其論文《僭越與盲目的虛無圖景——〈群魔〉中的虛無主義群像》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群魔》中表現的虛無主義精神。在文字細讀的基礎上，張變革歸納了虛無主義群像的類型，闡釋了其精神特質。如果把虛無主義精神引入到終極追求，就形成了人神學說——以自己代替上帝的虛假學說。僭越是對傲慢極限的挑戰，也是虛無主義最深層的精神特質。在剖析這些負面精神現象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勾勒出了人走出虛無的精神圖景，即以寬恕和憐憫的愛重建人的心靈秩序。

本屆暑期國際研討班加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再一次突出了“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的跨文化、跨學科特徵，拓展了比較文學研究的視野，也豐富了宗教研究的方法。顯示了“神學和人文學”這一研究進路在多元文化處境中強大的學術激發力量。